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三編 第十七冊

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
對「恢復」態度的轉變 (1163~1207)

張維玲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三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7 冊

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
「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

張 維 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
(1163 ~ 1207) / 張維玲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2010 [民 99]

序 2+ 目 2+162 面: 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編: 第 17 冊)

ISBN: 978-986-254-102-9 (精裝)

1. 政治鬥爭 2. 中國政治思想 3. 南宋史

625.2

99001280

ISBN - 978-986-2541-02-9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七冊

ISBN: 978-986-254-102-9

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 「恢復」態度的轉變 (1163 ~ 1207)

作 者 張維玲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02-2923-1455 / 傳真: 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 (精裝) 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
「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

張維玲 著

作者簡介

張維玲，1984年生，台大歷史系學士班、碩士班畢業，目前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師從梁庚堯老師，研究領域與為宋代，目前以政治史為主要方向。

提 要

本文主旨是藉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四因素的相互作用，架構起南宋中期的歷史進程，以闡述南宋中期的政治特色。道學型士大夫是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的概念，指該士大夫與道學家有共同的理想或理念「型態」，此即是與朱熹「氣類相近」之處，他們之間存有複雜的交遊網絡；近習則是皇帝身旁、處於內朝的寵臣；「恢復」即指「恢復中原」，是南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專有指稱。

第一章以事件為軸，並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說明在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不斷向宋孝宗聲討近習之害的士大夫，即以所謂「道學型士大夫」為主。他們共同的反近習態度，就是使他們凝聚成「道學集團」的因素。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深層原因，乃因近習干政破壞了「紀綱」，使外廷臣僚無法守其「職分」。此外，自秦檜當政時，便與高宗朝近習聯合，結成主和陣營；這種政治態勢延續至孝宗隆興時期，反映在主和宰相湯思退與近習龍大淵合作，並與以張浚為首的反和議派鬥爭，道學型士大夫則多支持張浚。而近習對和議的參與，多少使道學型士大夫感到和議更具不正當性。

第二章討論在道學型士大夫反近習的政局中，政策性議題「恢復」為何發生質變。歷來論宋孝宗的著作，一方面無法忽視孝宗寵信近習，一方面又肯定他對「恢復」的努力，彷彿兩者毫無關聯、可以分開看待。本章指出近習對「恢復」事業廣泛、深入的參與，使外廷部分官僚職權被侵奪，而軍中賄賂公行，也使恢復事業弊病叢生；其次，近習與主恢復宰相所採取的恢復策略是「急進」的，在朝野迎合急進恢復的言論充斥下，南宋很有可能未準備充分就與金開戰。這都使「恢復」在道學型士大夫心目中發生變質，成為非正義群體獲取己利的招牌，於是道學型士大夫不得不放棄與金「不共戴天」的復仇論調，並轉而強調修政「十年」，甚至贊成暫時與金和議，以攻擊急進的恢復政策。近習不論是在隆興時主和，或乾道時轉為積極參與恢復工作，都可見其配合皇帝的意志。朱熹曾說：「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這個評論，便要置於此政治態勢下才得以真正理解。

第三章討論道學型士大夫諫近習與恢復後，如何面對不利的政治局勢。張說事件中，浙東事功學派也加入聲討近習。龔茂良（亦為道學型士大夫）事件尤為重要。近習曾覲為了打擊道學集團，利用諫官以「不談恢復」等罪名彈劾參政龔茂良，爾後，更以「植黨」罪名打擊與龔茂良要好的道學型士大夫，這即是南宋中期道學首次被控結黨。但因孝宗急採煞車，而未使黨論擴大，但也因此學界容易忽略龔茂良事件。到了淳熙八年，孝宗有感於恢復之無成，一方面逐退了內廷的近習，一方面外廷的趙鼎罷相，結束了急進的恢復政策。

第四章討論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1182～1207）時期的政局，在那些方面延續自淳熙八年以前的政治態勢，「慶元黨禁」在此脈絡下將可看出其深刻意義。韓侂胄的近習身分使他遭到道學型士大夫激烈的反對，因此，他實比余英時先生筆下的「官僚集團」更有理由對道學反感。依此而論，慶元黨禁絕非獨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南宋中期道學集團與近習最後也最激烈的對決。而韓侂胄過去受到孝宗影響而產生的恢復意識，使他當權後留意軍事，似無愧於他的前輩近習，爾後更將恢復付諸實踐。未充分準備的開禧北伐，仍得到朝野蜂起的迎合聲浪，道學型士大夫則有不少人站出來呼籲謹慎，反對北伐，這也重演了孝宗乾道六年急進恢復與道學集團穩健態度的對立。

序 言

這篇論文是以四個要素（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的互動來討論南宋中期的政治史，但最初與這個問題結緣是從「近習」開始的。2007 年暑假，我在讀《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時，讀到宋孝宗逐近習龍大淵、曾覲一章，引發了我的興趣。寫成後卻發現近習是最受史料限制的一群，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份史料是站在同情近習的立場發言；然而，透過文中勾勒的政治環境，或許多少也能揣想近習在歷史時空中的難為吧！

很多人認為，社會經驗不足的年輕歷史學工作者，討論起政治史很可能無法深切。我雖然同意這個看法；但也必須坦誠，自己總是不由自主地被活在歷史舞台上的人物互動所吸引，選擇一個政治史的題目對我而言或許是很自然的。我只有透過善用同理心，彌補自己人生經驗的貧乏。在文中描寫的「故事」中，我努力在歷史學分析式的論述與呈現歷史人物活潑的個性與心緒之間找平衡，成敗與否，就由讀者來判定。

這篇論文寫作於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2 月，初步完稿後，經過多次的修改，好幾次甚至將整節重新編寫。在這過程中，我最要感謝的就是我的指導老師，梁庚堯教授。梁老師對我的論文付出很大的關心，前後多次仔細地幫我看論文；有一陣子，老師見到我，都會告訴我他想到哪些修改方向，讓我很有一種老師和我一起努力的感動。梁老師以他對宋代深厚的了解為基礎，對我和我的論文有著很深的理解，也因此，他所提出的意見總讓我有「的確就是應該這樣」的欣喜；當然，很多因為我學識淺薄而犯的錯誤，在他的指正下得以避免。其次，我要感謝我的論文口試委員，黃寬重教授和柳立言教授，他們的意見給我很大的啟發，口試後的論文修改，主要就是吸收了兩

位教授的意見，他們對於我這晚輩的叮嚀與期許，使我深深感激。此外，許多曾跟我討論過論文的師長、朋友，也都有助於我不斷反思，而使論點更為清楚。在此一併致謝。

我還要感謝閻鴻中老師，在碩士班生涯，我曾一度感到迷惘，是他的指引讓我對生命重拾信心。李文良老師對我有知遇之恩，在我碩士班時，也一直給予我幫助，也很謝謝他。當然，還有一直陪在我身邊的昱丞、婉茹、劍儀和皓雲，以及我最親愛的家人，因為他們的關心，我才能順利完成碩士論文。

這篇論文的寫成不只象徵一個階段的結束，也宣示著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我希望將來能繼續在歷史學中耕耘，以回報所有關心我的師友。

張維玲 2009.06



目

次

序 言	
序 論	1
第一章 道學型士大夫的凝聚——反近習主力的形成	17
第一節 反近習的序幕——曾龍事件	17
第二節 近習參與下的和議與反和議鬥爭	29
第三節 道學型士大夫的排曾龍運動	35
第四節 紹興末反近習的端倪	44
第五節 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政治意義	48
第二章 「恢復」的質變	55
第一節 近習對恢復工作的參與	55
第二節 中外相應——近習與主恢復宰相的聯合	65
第三節 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的批判	72
第三章 黨論的興起與緩和	83
第一節 反近習執政——張說事件	83
第二節 近習興黨論——龔茂良英州之禍	93
第三節 黨論的消退	105
第四節 近習勢力的消退與急進恢復的放棄	111
第四章 政治特色的延續——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	119
第一節 孝宗後期政局與官僚型士大夫對近習的態度	120
第二節 光宗時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姜特立的批判	126
第三節 寧宗前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韓侂胄的批判	134
結 論	149
參考及徵引文獻	153
附錄：各章節出現的道學型士大夫	161

序 論

宋代政治史研究，存在著時代分佈不平均的現象，寺地遵先生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便說：「在時代上，北宋的優勢，正突顯南宋的貧弱。」

〔註1〕朱瑞熙、程郁的《宋史研究》則具體統計了宋代帝王研究的分佈，他們指出：「至今為止，有關北宋帝王研究的論著約占總數的 80%，其中太祖、太宗及徽宗三帝的論著即占總數的 65%；而有關南宋後七位皇帝的論著單占總數的 3%。」〔註2〕這便是說，南宋除了高宗以外，後七位皇帝總共 116 年（1163～1278）的統治，雖占整個宋代統治時期的 36%，但目前學術界對其投入的關注是不成比例的少。這也表示，如果我們要填補對宋代政治史認識的不足，或許更應該把心力放在研究尚不充分的時期。

南宋政治史不但存在著研究比例的不均衡，還受到研究觀點的制約。寺地遵指出：「宋代政治史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在北宋方面，是王朝的創建與變法，在南宋方面，則是與異民族抗爭、對決並妥協之諸過程。」〔註3〕張其凡的〈論宋代政治史的分期〉也表示：「南宋政治的主線，則是生死存亡之爭。」〔註4〕許多宋代通論性著作便深受這種觀點影響，幾乎把南宋政治史描寫成一部民族興亡史。〔註5〕南宋與外族的互動，當然是南宋政治史十分重要

〔註1〕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1995年），〈序章〉，頁5。

〔註2〕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2。

〔註3〕《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頁5。

〔註4〕張其凡，〈論宋代政治史的分期〉，《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一輯（1993年，上海），頁1～16。

〔註5〕如張孟倫，《宋代興亡史》（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在南宋部分便著重對金、對蒙的和戰問題；金毓黻，《宋遼金史》（台北：樂天，1971年），則將南宋政治分成對金之和戰與宋、金之滅亡兩方面來討論；方豪的《宋史》（台北：

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如果把關注焦點過多的放在南宋與外族的交涉與對抗，便很容易忽略南宋內政的發展，甚至因此無法理解其與外族互動情況的根本因素。

在把南宋政治史看作是一部民族興亡史的脈絡下，研究的焦點也很容易集中在幾位與外族交涉或對抗特別有影響力或代表性的人物上。朱瑞熙、程郁的《宋史研究》在討論宋代政治史的重大爭論一章，將之分成五節，分別討論宋代帝王、岳飛、王安石及其變法、民變、范仲淹及慶曆新政，〔註6〕足見北宋的研究多於南宋，南宋的研究熱點則是「民族英雄」岳飛；而從山根幸夫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對宋代研究的介紹也可發現，南宋政治史的研究聚焦在岳飛、秦檜、韓侂胄、朱熹、文天祥幾位人物。〔註7〕這反映了對南宋政治史的研究，與其說是關心政治史的發展走向，不如說是關心這些人物所表現出的民族熱情或禍國之罪。我們很難想像，「眾多官僚」參與的政治，能夠透過了解「少數個人」便弄明白，這樣的研究方式，容易有見樹不見林的危險。因此，若要了解政治的發展過程，更應該把人物當作透視時代的研究取徑或視角，〔註8〕這也將使政治史研究很難滿足於聚焦在單一個人，而更可能將重心放在對當時政治發展有關鍵影響力的各色人物或群體。

在研究取向上，寺地遵也提出了很好的反省，他指出：「在範圍的分佈上，制度、機構研究的卓越性，也反映出政治事件、政策決定、政治過程研究的不完全。」〔註9〕所謂「政治過程」，作者並未具體說明，鄧小南在其《祖宗之法》的序文中說：「就『過程』而言，如今，從事政治史研究的學者無不注意到長時段研究的必要性。」〔註10〕據此，筆者認為「政治過程」應該是指一連串前後相關的大小政治事件所構成的政治發展，這將能把政治事件放在前後的發展脈絡下來理解，以使我們了解個別政治事件的歷史意義，而以這種方式來研究政治史，也勢必拉長研究年限。寺地遵並指出，重視制度而忽

中華文化，1954年），則將南宋政治分成「南宋之建國與金人渡江之失敗」、「劉豫之立與宋金之媾和」、「宋金和戰之繼續」、「南宋之亡」四部分來討論。

〔註6〕《宋史研究》，頁1～2。

〔註7〕山根幸夫主編，田人隆，黃正建等譯，《中國史研究入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六章，〈宋元時代（一）：五代、宋〉，頁523～524。

〔註8〕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2006年），〈序引〉，頁5。

〔註9〕《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頁5。

〔註10〕《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序引〉，頁5。

視過程的研究取向是受到唐宋變革假說的影響，因為爲了明瞭唐、宋間如何變革，宋代又如何成爲中國帝制後半期的原型，便「透過把宋代史當作類型加以比較的過程進行理解。」〔註 11〕作者爲了突破此閉塞，寫作了《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此書「不是著眼於政治權力的型態、結構，而是擺放在其運動、力學、動態的方面。」〔註 12〕這種研究取向，或許更能活生生地映照出歷史人物在政治場域中的活動，與他們是如何影響政治發展的走向。

接下來需要談談有關南宋政治史的分期問題。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專論高宗朝的政治史，可見其所謂南宋「初期」是指宋高宗一朝的統治；黃寬重先生的〈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在討論「南宋中期的和戰」時，敘述了孝宗朝到寧宗開禧北伐的和戰問題，可見這段時間是作者所定義的南宋「中期」，〔註 13〕與寺地遵的斷限恰可聯結。山根幸夫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論及南宋中期的政治研究，也包含了有關朱熹和韓侂胄的討論。本文亦將南宋中期定位爲從孝宗即位到寧宗朝開禧北伐（1162～1207），本研究就是要去挖掘這時期的政治特色。

基於以上的認識，本論文希望能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不足做一點努力。具體來說，本文的研究時期在目前研究成果尚不很充分的南宋中期，即孝宗到寧宗開禧北伐的一段政治史，尤其著重孝宗即位到淳熙八年（1181）之一段歷史；在研究取向上，本文重視內政的發展遠過於重視與異民族的對抗；重視「政治事件、政策決定、政治過程」遠過於對制度、機構的探討；對於人物在政治場域中的活動，重視政治「集團」遠過於重視單一「個人」。就論述方法而言，本文取法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和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就所論時代而言，則希望能填補兩書之間的部分空白。

依據筆者對史料的閱讀，認爲可由四項關鍵要點來把握南宋中期政治史，即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以及「恢復」議題。南宋中期的許多政治事件，便由此四要素互相糾結而成，以至若單論任何一方或乎略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明瞭南宋中期的政治動向；而這些政治事件又是環環相扣，並構成南宋中期所謂的「政治過程」。以下便將此四要素作一介紹或定義，並概述本

〔註 11〕《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頁 13。

〔註 12〕同註 11，頁 19。

〔註 13〕黃寬重，〈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出版，1995 年），頁 169～189。

文的論述重點。

統治南宋中期最久的皇帝就是宋孝宗（1163～1189）。孝宗的統治風格，可用王應麟的一句話來概括：「隆興至淳熙（分別為孝宗第一和最後一個年號），萬機獨運，而大臣充位。」〔註14〕呂祖謙也曾向孝宗說：「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註15〕顯示孝宗是位大小事都要管的皇帝。乾道三年（1167），剛任參知政事的陳俊卿便勸諫孝宗：「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註16〕孝宗這樣的統治模式對南宋中期政局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光宗和寧宗朝前期，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延續了孝宗的統治模式。因此討論孝宗的統治特色和其對政局的影響即為本文要處理的重點之一。

「近習」一詞，是宋代人常用的稱呼，在正史中，又稱之為「佞幸」。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稱近習為「天子中寵臣」，〔註17〕意思即為在皇帝左右、處於內朝，並得到皇帝寵信的臣子。在〈太史公自序〉更清楚簡要地定義了近習：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註18〕

可見近習得以受寵乃因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即是靠著巧言令色的本領，得以取悅皇帝，其二，他們具備各種才能，以獲得皇帝的賞識與重用。可以想見，每位皇帝身旁都多少會有這樣有色有能的人物，因此司馬遷可說是點出了帝制時代的一項弱點。但皇帝身旁的近習，是否足以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關鍵則在於皇帝個人的施政風格。

宋孝宗一朝，便是近習異常活躍的時期。《宋史·佞幸》指孝宗「剛好專任，明好偏察」，〔註19〕這樣的專權性格，使孝宗不易信任外廷臣僚，而傾向任用與自己親近的近習。孝宗一朝近習眾多，南宋後期的張端義在《貴耳集》提到：

〔註14〕王應麟，《困學紀聞》，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三編》（台北：商務，1966年），卷十五〈考史〉，頁8。

〔註15〕呂祖謙，《東萊集》，收入《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3年），卷三〈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頁14。

〔註16〕《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收入《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1967年），卷四十六，乾道三年十一月，頁15。

〔註17〕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1983年），卷一二五〈佞幸〉，頁3194。

〔註18〕同註1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頁3318。

〔註19〕《宋史》，卷四七〇〈佞幸〉，頁13677。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不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夙撰。曾覲、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爲；外戚則有張說、吳玕；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幕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註20〕

除了說明孝宗朝近習有「讀書作文」之「能」外，也可看出，近習可能具有宦官或外戚身分。文中更舉出多達十五位近習，但張端義所舉，未必皆合於事實，也未必皆重要，〔註21〕如中貴甘昺之兄甘昇文中不提，但他在孝宗朝的重要性遠大過甘昺。諸近習在《宋史》中有傳者，應可代表其人具有重要性。《宋史·佞幸》中的孝宗朝近習有龍大淵、曾覲、王抃、張說四人，而甘昇則在《宋史·宦者四》有傳，這五人在當時的影響力，又可由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所上〈戊申封事〉看出：

至於左右便嬖之思，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註22〕

可見此四人最受孝宗寵信，也勢力最大；所謂「傾動一時」，即指他們曾引起政治紛擾。〔註23〕而這年朱熹所極力攻擊的近習則是宦官甘昇：

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註24〕

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孝宗朝近習，便只限於這較爲重要的五位。他們因爲都在皇帝左右，彼此乃相互交結：

（曾）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註25〕

可見五人中，除了具有外戚的身分的張說，〔註26〕沒有史料直接表明他與其

〔註20〕張端義，《貴耳集》（鄭州：中州古籍，1995年），卷下，頁56。

〔註21〕岳珂，《桎史》，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1981年），附錄，〈諸家著錄與論跋·十七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云：「張正夫端義貴耳集，……頗自夸詡，而文尤拙，其所引據之謬，四庫提要已備列之。」頁188，可見《貴耳集》被認爲多有疏漏，其中將辛棄疾列爲幸臣，即明顯不可信。

〔註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0～25冊，上海：古籍，2002年），卷十一〈戊申封事〉，頁593。

〔註23〕將在各章節陸續提及。

〔註24〕《宋史》，卷四三九〈道學三·朱熹〉，頁12758。

〔註25〕《宋史》，卷四七〇〈佞幸〉，頁13691。

〔註26〕《宋史》，卷四七〇〈佞幸〉：「張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孝宗妻）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頁13692。

餘四人交好；乾道四年（1168），與曾覲交好的龍大淵死後，曾覲又與王抃、甘昇互相援引，結成勢力。五位近習中，除了甘昇外，其餘四位都在淳熙八年底以前去世或被逐出京城，〔註 27〕因此討論孝宗朝近習，不免對孝宗前期的統治有較多著墨。〔註 28〕

許多論宋孝宗統治的文章，都會提及近習問題。其中以柳立言先生的博士論文“The Absolutist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r. 1163~1189)”最為詳實，作者將孝宗因寵信近習而與宰執、臺諫官起的衝突，放入孝宗專制統治的脈絡中來考察，使讀者對孝宗的專權得到鮮明的印象；並認為孝宗因高宗的影響而對權力感到患得患失，且鑑於前朝宰相秦檜的專權，而思將大權獨攬於己。〔註 29〕不過，目前與孝宗朝近習相關的論著，重點都在孝宗各層面的統治、用人策略，近習問題不過是其中一個側面，〔註 30〕亦即，這樣的論述並

〔註 27〕 將在各章陸續說明。

〔註 28〕 有關孝宗朝近習，有幾點須略做說明。其一，這個時期活躍的為何是近習而非宦官？如果這個問題可以成立，那麼或許與宋代較為防範宦官弄權，且兩宋之際宦官勢力遭到嚴重打擊有關，宋高宗也曾聲明宦官用事，「理宜痛革」，見張邦煒，《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南宋宦官權勢的削弱〉（北京：人民，2005年），頁 78～95。其二，孝宗朝的近習是否可視作「內朝」？據張邦煒，〈兩宋無內朝論〉，《河北學刊》。第一期（1994 年，河北），頁 88～95，引《韓非子·孤憤》：「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又引錢穆先生的意見，認為內朝的實質是「用私臣」，據此，近習親近皇帝的特質，使其應被視為內朝；更實際的判斷方式是看孝宗朝的官僚如何看待近習，從後文陸續將引用的史料可見，當時人常將近習與外朝對立，將近習視為與「外」相對的「中」或「內」，例如袁樞在淳熙五年向孝宗諫近習問題時便說「內庭行廟堂之事」，即處於內朝的近習做了原本應由外朝負責的事。因此，本文亦將近習的性質視為內朝。其三，據鄧小南，〈掩映之間——宋代尚書內省管窺〉，《漢學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二期（2009 年，台北），頁 5～42，指出尚書內省有「與外人不相見」的特性，然宦官因處於內外的通道上，容易竊權，或與外廷官員勾結，因此容易受外廷士大夫的激烈批評；同樣地，近習也有類似的性質，即雖處於內朝，但與外廷士大夫時有接觸，並因而易遭士大夫猜防。

〔註 29〕 Lau Nap Yin, (1986). The Absolutist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r. 1163~1189).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p. 92~106、132~147。亦可參考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宋史研究集》，第十九輯（1989 年，台北），頁 203～256。

〔註 30〕 如劉伯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華，1971 年），頁 404～408，對孝宗朝政治及近習問題有較詳細的介紹；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1989 年）於〈孝宗政治〉一節亦提及近習，頁 350～351；大陸學界如王德忠，〈宋孝宗加強專治集權淺論〉，《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一期（1989 年，吉林），頁 42～46；陳曉瑩，〈宋孝宗治國政策與成效之評析〉，《甘肅社

不能讓我們認識近習問題在孝宗朝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專論孝宗朝近習問題的有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側近官〉，該文重點在討論孝宗如何透過近習直接掌控軍政大權，可增加我們對孝宗朝近習作用的認識。〔註31〕

如果近習單牽涉到孝宗的統治方式，那麼我們大可滿足於既有的研究成果。然而，孝宗朝近習，深深牽動了當時士大夫的政治活動，其影響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也引人注目。前引張端義《貴耳集》便說：「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覲）、龍（大淵）、張（說）、徐（本中）之門者」。近習既接近皇權，外廷士大夫想與近習交結，自然不足為奇。然而偏偏有一群士大夫，對近習抱持異常的反對態度。朱熹在〈戊申封事〉中感慨良多的向孝宗說：

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言又不過此。〔註32〕

足見朱熹一生中三次面見孝宗，都有意識地提到近習，他對此問題的重視不言可知。朱熹的摯友張栻在乾道末任吏部員外郎，曾與近習曾覲有互動，據說：

張南軒待小人甚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南軒急掩其窗櫺，覲慚，手不能下。〔註33〕

可見曾覲遭到張栻不留情面的拒絕。曾受學於張浚（張栻之父），而被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註34〕且與張栻等道學家友好的楊萬里，在其文集中記錄了一段文字：

會科學》，第三期（2001年，甘肅），頁45～47；方如金，〈試評宋孝宗的統治〉，《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六期（2003年，浙江），頁9～13；王明，〈宋孝宗及其宰相王淮〉，《通識研究集刊》，第五期（2004年，台北），頁175～235；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3。

〔註31〕 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側近官〉，《集刊東洋學》，第八十八卷，2002年，頁83～103。

〔註3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頁613。

〔註33〕 《宋人軼事彙編》，卷十四〈張浚子栻〉，頁780。

〔註34〕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三·楊萬里〉：「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頁12863。又周揚波，〈楊萬里詩社與南宋孝宗朝政治〉，對楊萬里詩社中的友人有細緻的考證，其社友包含林光朝、謝諤等理學家，也指出楊萬里是理學的信徒。

（李）宗質乾道庚寅（六年）爲洪倅時，予爲奉新縣令，屢謁之。……

明年，予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覲姻家也，覲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再也。〔註35〕

可見楊萬里雖曾與李宗質過從甚密，然一旦得知李宗質與曾覲的關係，便不再與之往來，顯示楊萬里對與近習交結的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朱熹、張栻、楊萬里對近習的排斥態度，使我們合理懷疑，孝宗朝反對近習的士大夫很可能與道學有關。南宋後期的理學家眞德秀在〈著作劉公奏藁〉，印證了這個推測：

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嚙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俊卿）、參政龔公（茂良）、朱文公、張宣公（栻）、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劉夙），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註36〕

眞德秀一方面強調了近習問題在孝宗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舉出七位諫近習者，他們有些是道學家，有些是與道學家交情深厚的士大夫，〔註37〕這顯示反對近習者，是一與道學有關的特定群體；〔註38〕說他們「前後若出一口」，更透露了他們私交甚篤，且有共同的信念。

若反近習的士大夫，確與道學有密切關係，那麼如何指稱、界定這群士大夫，便成爲本文必須說明的問題。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認爲孝宗統治後期，即淳熙八年以後的政局是兩大集團——「官僚集團」與「道學集團」的對立，余英時先生對「道學」有如下的說明：

〔註35〕 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卷一一七〈李台州傳〉，頁11。

〔註36〕 眞德秀，《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著作劉公奏藁〉，頁8～9。

〔註37〕 這些人物與道學家的關係，將在各章節陸續論及，此處暫不贅論。

〔註38〕 南宋中期士大夫對近習的批判，有一些相關論著。如周揚波，〈楊萬里詩社與南宋孝宗朝政治〉（《景岡山學院學報》，第五期，2006年，浙江），頁10～14，認爲支持道學運動的楊萬里及其詩友，對近習加以反對；趙峰，〈朱熹的終極關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4年），依據對朱熹文集的詳細閱讀，對朱熹向孝宗進言近習問題，有較完整的介紹，但因主要只從朱熹文集作討論，故對當時的政治背景，較缺乏深刻的分析。金春峰，〈宋代的學派與政派——從「紹興學禁」到「慶元黨禁」〉（《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二十八卷第三期，2007年，湖南），頁1～12，運用了「道學型士大夫」的概念，認爲其對近習皆持反對意見，但此文只用了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爲史料，且未對此論點提出具體論證。

通孝、光、寧三朝而論，朝廷上的士大夫隱然存在著反對「道學」和支持「道學」兩大壁壘，而一以朱熹為其樞紐人物。……「道學」兩個字確不是專指程、朱學派，而擴大到一切與朱熹氣類相近的士大夫。〔註39〕

可見這兩大集團的分野，不在學術意見上的差異，而在於政治立場的選擇；並且，余先生也對道學採取了比較寬廣的定義，即擴大到「一切」與朱熹「氣類相近」的士大夫，意為他們與朱熹有相似的理念與行事風格，因而在政治上採取相近的立場或態度。余先生也認為支持道學和反道學的團體，雖在樵川樵叟的《慶元黨禁》中，開列了兩張名單，但兩張名單「當然遠不夠完整」，因為名單是以在黨禁時未去世者為限，故而，像是曾經推薦過朱熹的宰相陳俊卿、參知政事龔茂良便未算在內。〔註40〕這似乎是認為，支持過朱熹的陳俊卿、龔茂良，因為與朱熹「氣類相近」，故也可算是道學集團的成員；由此亦可知，道學集團的規模和成員，隨著時間的發展而不斷有所變動。〔註41〕

然而，余先生畢竟沒有對文中使用頻繁的「道學型士大夫」或「道學集團」下明確定義。余先生在第十章舉出薛叔似、尤袤、詹體仁、黃裳、劉光祖、羅點六人，分析他們思想中的道學色彩，及其與道學領袖（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的交遊，以論證孝宗晚年擢用「道學型士大夫」；這表示，一位士大夫具備了道學思想，且和道學領袖有深厚交情，便是道學集團的成員。余先生又論孝宗晚年擢用三相：周必大、留正、趙汝愚，認為他們與同時代的理學家領袖都很有交情，並深得理學集團的信任，他們當政時，也大量擢用「道學型士大夫」；不過，他們代表北宋儒學的主流，而未服膺理學。〔註42〕那麼，他們是否可算是道學型士大夫或道學集團的成員？就成為界定這幾個專有名詞的關鍵。對此問題，余英時先生似乎並未提出明確意見。但周必大等人，確實參與了官僚集團與道學集團的鬥爭，且堅決支持、甚至領導後者，因此將之排除於道學集團之外似乎並不妥當，田浩先生為《朱熹的

〔註39〕《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局，2004年），第七章〈朱熹時代的黨爭〉，頁336、339。

〔註40〕《朱熹的歷史世界》，第七章，〈朱熹時代的黨爭〉，頁336～337。

〔註41〕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台北：允晨，2008年）：「我們很難對這個群體下嚴格的定義，因為它的規模和成員不斷變化。」頁34。

〔註42〕《朱熹的歷史世界》，第九章第五節，〈周必大與理學家〉，頁497～524、第十章第一節〈孝宗晚年部署之一〉，頁531～551。